

王羲之

王羲之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王羲之传

刘长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羲之传 / 刘长春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057-2678-9

I. ①王… II. ①刘… III. ①王羲之 (303~361) -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267 号

书名	王羲之传
作者	刘长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3.2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78-9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物传记

——序刘长春著《王羲之传》

陈振濂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大师。几千年来的书法史，几乎就是一部以王羲之为开山祖的书法史。曾经有论者认为：中国书法史在过去是由文字书写史与艺术书法史两部分构成的。文字书写史包括从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以下的发展史，其特征是文字字体演变频繁，篆隶草章直到楷书；且书写者（书法家）不留名，没有名家意识与名作概念。而艺术书法史则当从魏晋南北朝的张芝、钟繇开始，王羲之是第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一时期文字字体演变几乎停顿，但书法艺术的追求却被大力张扬，而且名家、名作的意识极强，迄今为止，仍未消歇。如此一来，则自王羲之开始才有书法史（而不是文字书写史），于是才会有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的“开山祖”一说。虽然这样的说法未必全面，但即此已可看出王羲之的超等重要性 with 超等影响力。

关于王羲之的威望与影响力之巨大和无与伦比，学者们有各种说法。比如有说他是因为唐太宗推崇才成为一代书圣的，又比如说他是因为有庞大的王字书风追随者才成为经典传统的……但种种说法也未必尽然，比如王羲之迄今为止并无一件真迹传世，流传的皆是摹拓与刻拓。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不利于他作为经典与偶像的。又比如，王羲之一生既有世胄贵统之文化优越，又有忧患

疾苦之生涯窘迫，其生平很难一以概之。即使是做官，也远远不足以震烁天下，更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赫赫功业。像这样的形象，本来也是和“千古一人”的书圣至高地位不相符的。而我以为：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王羲之，实在是因为他有一卷《兰亭序》和有一个浙江绍兴兰亭的存在。有趣的是，《兰亭序》的传世，如果仅仅是真迹流传，有如《祭侄稿》之于颜真卿、《黄州寒食诗帖》之于苏轼一样，也无非是有一份经典而已。但《兰亭序》却是一卷摹本，原迹据说“已入昭陵”，后世为它的真假对错等等聚讼纷纭，于是陡然增加了许多悬念，它竟成了一个不知谜底的千古疑案，按今天的话说，是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又以有了一个“兰亭”之地，山明水秀，天朗气清外加曲水流觞，于是就有了以修禊为主的千年民俗风气的流传。这等于每年在替王羲之开“纪念会”。有《兰亭序》这样充满悬念的经典，又有“兰亭”这样不可再生的独特人文“空间”环境，王羲之才有可能从一个艺术专业圈中的圣贤，转型成为大历史中的伟人。前者虽然地位尊崇，但影响力不出圈子之外；后者则是偶像与神，家喻户晓，万代楷模。只要兰亭地方的山明水秀不变，只要三月三的上巳修禊、曲水流觞不变，则王羲之必然永恒。

迄今为止，研究王羲之的著述论文汗牛充栋，有研究他的家族兴亡、门阀身世的；有研究他的南渡与到会稽以及当时行为的；有研究他仕途不顺遂、与世俗难相俯仰的；有讨论他与庾、谢、郗诸门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传世尺牘的流传经过的；有专心于这些墨迹尺牘文辞含义的；有研究收集关于他所书《兰亭序》的相关传说的；有研究他与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与王献之、王氏子弟之关系的；有研究他与卫夫人的师承、乃至他与钟繇、张芝的关系与书风来源的；有研究他在后世为何受唐太宗追捧史事的；有研究二王书风、魏晋笔法在后世的传承的；当然，还有以他为出发点，去研究《兰亭序》之真伪，宋代“兰亭学”学术史的……但尽管有如此多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角度，我们却还是希望有一部对王羲之生平作系统介绍与研究的著作，使学界

对王羲之有一个完整而全面——尤其是一个相当“人文”的印象。

写人物评传可以有两种写法。历史学家写历史人物评传，一般会采取几种不同的视角：由于是历史人物评传，崇尚实学者会先从年谱年表出发，寻找传主生平的基本脉络，然后“照单抓药”，形成“传”再加上“评”。它的特点是处处坐实史事，十分可靠，但却难以勾画人物的音容笑貌与面对许多人生际遇时的心理活动状态——因为许多史实在被记录下来之后，都只表现为一种记录结果，但还有大量丰富生动的过程变化、可预料的变化和未可逆料的随机的变化，或许还会有改变原定结果的变化，却不可能在史书的词条记录上呈现出来。因此，相比于实时的事物、生平的变迁而言，年谱式的忠实可靠的人物传记，过于平面化，通常也是不那么可爱、不那么生动活泼的传记，它的可读性不会太强。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依据历史人物流传至今的几个生平转折的基点，填补上原有的空缺与不为后世了解的细节与过程，在缺乏史料与史实（或在需要人物“剧情”生动活泼）的情况下，加入许多空泛的想象，作一些无伤大雅的“戏说”。由于许多想象与戏说是今天的作者所为，于是它很难真正找到古代当时的感觉，遂蜕变为以今人想象之“戏说”，去填补古人传主在古代的生涯“空缺”的尴尬来。这样的人物评传，好看是好看的，纵横八极，趣味横生，只不过从反映人物本身的真实性而言，却是大有可虑的。

也许，站在书法史家的立场上去看王羲之，又可以把他看作先是“书圣”，其次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坊间又有几种王羲之传论的著作，是有意“忽略”其人物历史的发展轨迹而着重于其书法师承、传世经典以及艺术成就之类。这样的“传论”，却又太像书法评论，艺术批评的角度较明显，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脉络与线索，却又显得不太完整，谓为《王羲之书法评传》可，谓为《王羲之传》则不可。

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是一部极有才华的作家的精心佳构。这不仅是因为刘长春先生本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他的许多散

文与学术随笔，在文学界已有相当的声望与令誉；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投身于“书法热”的资深书法家，当年也曾作为“书法青年”为书法而热血沸腾奔走呼号过。在浙江书法界，他同样是资深人士。如果不是因为曾担任过相当的行政职务，本来应该是文学界与书法界的名流。现在由他来写这部《王羲之传》，以他在文学上与书法上都有三十年以上的双重积累，自然是十分合适和妥贴的。

过去我们看书法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对书法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刻画人物性格、分析思想活动、理出传主人物一生的出处行藏等方面，则显然逊色得多；至于要做到文采斐然，颂之满口余香，更是难以企及。而我们再看单一的文学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关注的倒是历史、人物的大立场，但仅仅把书法材料拿来作点缀，对于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而言，只是粗略地涉及专业皮毛，却无法使书法真正地贴切到传主的人生际遇之中，显然也是难以避免隔靴搔痒之讥的。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能够以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作为参照，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出他作为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双重优势，我以为是可以于眼下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中国书画史的人物研究与发掘中。画家“评传”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出过一批，为最先进；书家“评传”则迄今为止所涉者甚少，寥寥不过三五种，为较后起。是则刘长春先生的大著一旦行世，或许可为时世立一标杆、为学界开一风气？即使现在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以为，应该有理由对刘长春先生作如此的期许——他的创作状态正属良好，他的笔耕势头也正健旺，假以时日，当别人还不太在意之际，或许他就可能悄悄地积累日月、积累笔墨，以跬步积为千里之行，以小流积为江河之淼。

犹忆去岁盛夏我曾有台州之行，当时应邀演讲的主题，好像是关于“城市文化”方面的内容。演讲休息时，许多听者热心提问的，却是书法问题，并以演讲未以书法为题而遗憾。刘长春先生也在席。而我仅停留几个小时即匆匆返

杭城，未能与长春先生深入讨论，我亦至今引为遗憾。在台州的几个小时，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的，却是鲁迅先生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气”。台州土风、民风“硬气”，做学问也未必不“硬气”。刘长春先生几十年笔耕不辍，正是这样一种“硬气”的性格使然。我衷心祝他在人物传记、在以书法为母题的写作中，也时时体现出这样的“硬气”。立定脚跟不放松，则在当代书学理论界，他应该是能独树一帜的。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九月澳门返里

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

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

——读刘长春先生《王羲之传》

林 非

长春先生从台州寄来还飘散着墨香的《王羲之传》原稿，我轻轻地取出文本，在炎热的天气中，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

长春先生既擅长散文创作，又精于书法艺术，由他来撰写这位“书圣”的传记，一定会才思横溢，笔底生花，在清朗隽永的文字之间，诉说出多少对于文化和生命的感悟。他于前年出版的《书家列传》，已经让我读得津津有味，颇受启发，时常盼望着能够继续读到他的新作。

正是在此种流连忘返的情绪中间，我读完了这部传记。一边仔细揣摩，一边击节赞赏，真佩服他把握历史和描绘人物的能力。他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年前那段充满战乱和灾难的岁月，写出了王羲之骨格清奇的人格之美、孤高之美和书法之美。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在高门望族与名士显宦的生活圈子里，当儒学衰微、道家思想弥漫于人们的心灵之际，王羲之无论是为官、为人，是如何坚持自己人生的理想，如何发挥出自己天赋的才智，经过刻苦的磨炼，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的命运和记忆，在我们的阅读中复活了。从时代环境的勾勒和渲染，直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摹写，在长春先生的笔下，都显得多姿多彩，而又顺理成章，这样当然就容易受到更多读者

朋友的认同和喜爱，并且会深深地留存在心中，增添了自己对于华夏传统文化的理解。

读完了长春先生这部形象生动而又涵义深邃的传记之后，确乎是将我原来对于王羲之零星的记忆，很通畅和完整地贯通起来，还令我回忆起五、六十年前浏览《晋书·王羲之列传》和《世说新语》时的种种情景。“温故而知新”，应该说，这种阅读效果，完全要感谢长春先生如此灵动和成功的书写了。

在当时那种紊乱、残酷与幽暗的社会环境中间，正统儒学逐渐显出了自己迂腐甚或是虚伪的精神面貌，从而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于是主张自由解脱与放任无为的老庄哲学，开始得到广泛的流传。在这样充满了动荡和惶惑的时代里面，王羲之确实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历史人物。他面对着到处弥漫的谈玄论佛的气氛，却很清醒地反对沉溺于清谈的风尚。他跟谢安诉说的一席话，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主张在当时“四郊多垒”之际，“宜人人自效”，真可以说是关怀现世的黄钟大吕之音。还有他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对于如何生存于人世的哲理，也怀着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他虽然并不热心混迹于仕途，还屡次辞让，可是在官场任职之时，却经常上书朝廷，力争减少繁重的赋役，还开仓赈灾，十分关心民间的疾苦，真是难能可贵，堪称楷模。从入仕到辞官归隐，长春先生确乎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孤独与强韧的生命的的心路历程。他不是“脸谱化”地简单描写，而是深入到历史与时代中，写出了王羲之人性与内心的复杂性。

又因为王羲之生活在这样较为自由和旷达的社会风气之中，就更容易保持自己天真烂漫与不谙世事的本性。譬如当那位跟他早已存有嫌隙的王述在升任扬州刺史的时候，因为自己任职的会稽内史，就得受其管辖了，王羲之气愤难耐之际，竟丝毫不顾设置地方官吏的惯例，派人去朝中请求，将会稽郡划离扬州刺史的管辖，而置于特地为其新建的越州之下。如此荒诞的念头，自然受到了诸多名士的讥笑。不过从这样的笑声中，却也见出他心灵的深处，蕴藏着

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性。可是，长春先生不说“荒诞”，却说是“天真与幼稚”，还说“慌不择路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可笑的举动的。我说王羲之‘幼稚’，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这就是贴着人心的一种体恤，是“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一种感悟。类似这样的文字，在这部传记中是不乏其例的。

在长春先生的这部传记里面，对于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阐述和评价，自然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贡献。在那个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长春先生又说：“时代给了王羲之一次机会，而且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他的笔下，有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东西变成了可能。”——这一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反复比较、研究得出来的。这对于读者朋友的欣赏书法艺术来说，一定会具有借鉴和启迪的作用。同时，在书中印制得很精美的几十幅图片，正好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始观摩与领悟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奥妙了。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言，历史学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读长春先生的《王羲之传》，与“书圣”相见悲欣交集处，使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好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这本书，如果每一个读者都能读出自己心目中的王羲之，这是一桩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北京静淑苑

目 录

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物传记

——序刘长春著《王羲之传》…………… 陈振濂 1

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

——读刘长春先生《王羲之传》…………… 林 非 6

家世与出身…………… 1

童年、少年的苦学…………… 20

从秘书郎起家…………… 43

会稽内史…………… 71

兰亭会…………… 90

辞官归隐…………… 110

仙 游…………… 131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 154

附录一：王羲之年谱简述…………… 191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192

后 记…………… 195

王羲之

【一】

家世与出身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1] 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的有力支撑”。^[2] “王字”，从内涵来说，指的是王羲之之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1]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导言：以王羲之（约303—361）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名家经典谱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初蔚为正统。此后一千年，其独尊的地位不曾受到严重挑战。

[2] 刘长春，《书家列传·导言·宣纸上的话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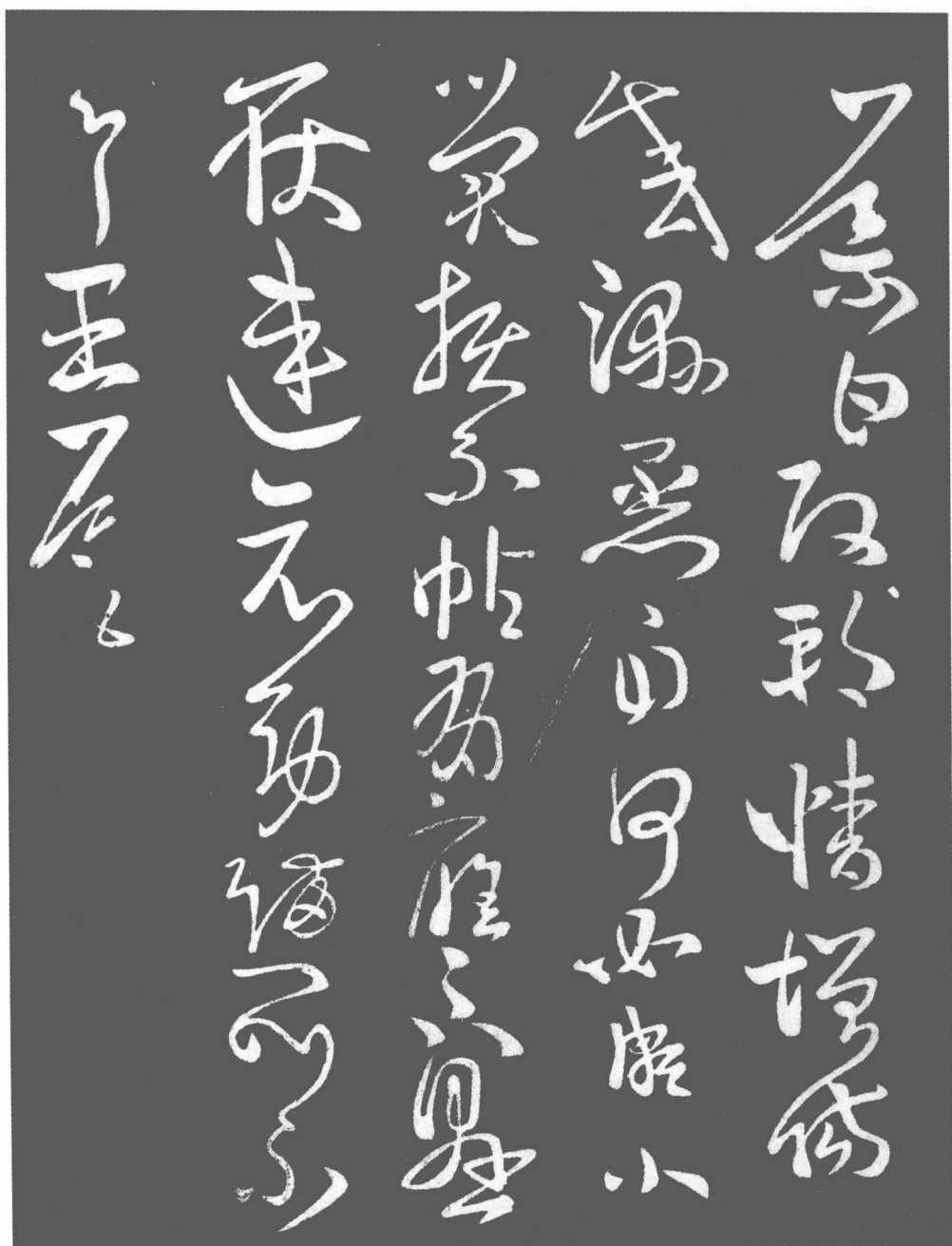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尝试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又因为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做官，宋人也有称他为“王会稽”的。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征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才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一个读书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受批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卷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髅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既有世代做官，又有世代儒门，还有具备两种资格，既是高官，又是名儒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权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



■ 晋·王导《改朔帖》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1]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彼此却成为忘年交、相得如同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这样认为。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东坡志林》）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勿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刀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一命呜呼，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而在四十五年之前的黄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欺负人家幼主寡母，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

[1] 《世说新语·风度》：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礼，宣布魏朝的成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司马家如法炮制”而已。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然后，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制造假象，施放烟幕，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是，人家对他还是不放心。司马氏集团里的钟会，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卷上），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直到今天，各种信息汇集眼前，人们才渐渐地读懂了，他的诗都是政治诗，对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曹魏亡国等都有间接的反映。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羨洪波，同始异支流”。所以，朱光潜先生称其《咏怀诗》为“中国最沉痛的诗”。由于压抑，由于孤独，除了“哭”与“酒”，内心的痛苦还是无从发泄，所以他又学会了“啸”。然而，那啸声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没有内容。对着群山云天，尽情长啸，响生林谷之风，消解的正是心头的块垒。

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所谓谈玄，我的一个理解是：明白的事理往糊涂里想，浅近的东西向深刻里说。比如水中游着的一条鱼，渔夫知道味道鲜美，想的是如何捕获；文人就不一样了，庄子和惠子在濠上讨论的却是人知不知道、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不就“玄”了！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